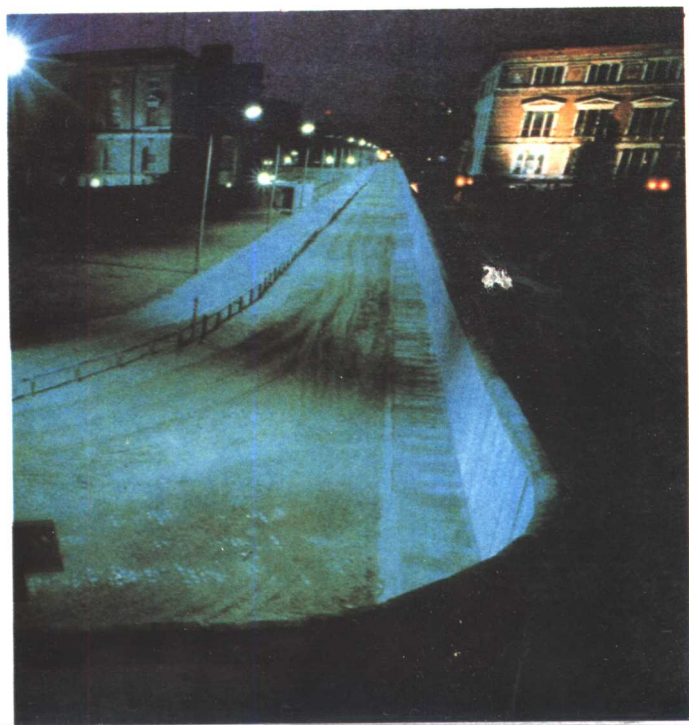




大墙倾倒之际

——克伦茨回忆录



大墙倾倒之际

——克伦茨回忆录

〔民主德国〕埃贡·克伦茨 著

沈隆光 叶绪玲 陆文杰 李念平 译

(内部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京)新登字021号

Egon Krenz

Wenn Mauern Fallen

Die Friedliche Revolution,

Vorgeschichte—Ablauf—Auswirkungen

Paul Neff Verlag, Wien, 1990

根据奥地利维也纳保罗纳夫出版社1990年德文版译出

责任编辑：高曾落

封面设计：丁 品

大墙倾倒之际

——克伦茨回忆录

〔民主德国〕埃贡·克伦茨 著

沈隆光 叶绪玲 陆文杰 李念平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外交部街甲31号 邮政编码：100005)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32开本 印张：7 插页：2 字数：154000

1991年10月第1版 1992年4月第2次印刷 印数：6001—17000

ISBN 7-5012-0378-4/K·71 定价：3.20元

(内部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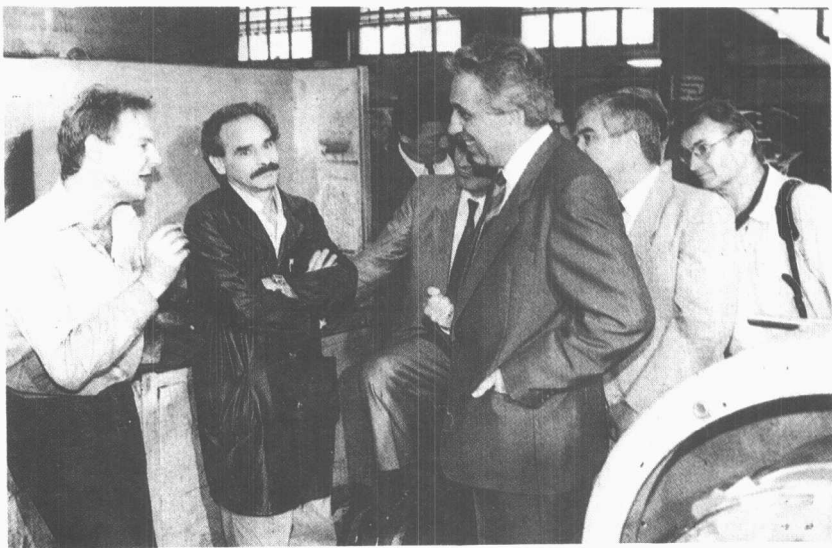
埃贡·克伦茨和他的母亲，1937年夏天



埃贡·克伦茨(前排中)在新勃兰登堡的托伦泽湖少先队夏令营，1950年7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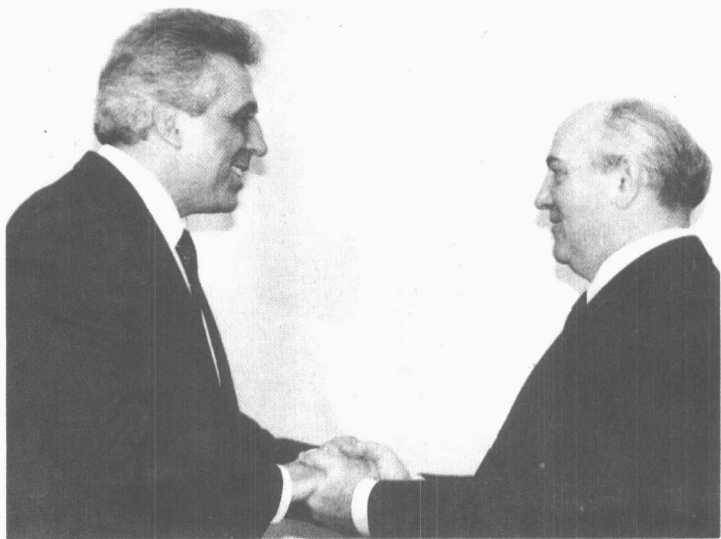
埃里希·昂纳克接见自由德国青年联盟中央委员会书记处，1976年



在柏林“10月7日”国营机床联合企业与工人交谈



1989年11月3日，埃贡·克伦茨作为民主德国新任国务委员会主席在国务委员会大楼接见外交使团；（从左至右）曼弗雷德·格拉赫、维利·斯多夫、埃贡·克伦茨、霍斯特·辛德曼



当选为党和国家首脑后对莫斯科进行首次工作访问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对埃贡·克伦茨表示欢迎和祝贺（1989年11月1日）



为联邦总理赫尔穆特·科尔访问民主德国进行预备性会谈：总理府部长鲁道夫·赛特斯(中)、民主德国总理汉斯·莫德罗(左)和埃贡·克伦茨(1989年11月)

出版说明

这本回忆录的作者埃贡·克伦茨曾是原德国统一社会党的主要领导人。他在任50天，最令人难忘之举是开放柏林墙。克伦茨长期以来曾一直被认为是昂纳克的接班人，但等他上台的时候，却以昂纳克的反对派的面目出现在政治舞台上。上台没多久，他本人又被推下历史舞台。最终，民主德国变成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一部分。

这段历史的变迁，只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波折。问题是：这样的波折能否避免？如何避免？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大墙倾倒之际》向我们提供了不少研究这一问题的内部、外部的背景材料。为此，我们将它翻译出版，以供我国各界读者阅读参考。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埃里希·昂纳克下野	4
一、上层人事更迭	4
二、昂纳克时代	28
三、万德利茨症候群	64
四、过于迟缓，必受生活惩罚	75
第二章 暂定的接班人	87
一、“致我的朋友和战友埃贡”	87
二、跟着而又反对昂纳克	109
三、转折的中央全会前夕	125
四、50天接受的“遗产”	130
第三章 柏林墙开放之际	143
一、11月9日 清晨	143
二、对民主德国公民的禁锢	147
三、小差错，大效果	156
四、人民载歌载舞越过边界	162
五、在一个和平的欧洲中的德国	173
第四章 1989年10月7日至12月6日纪实	178
附录	216
作者简历	216
德国统一社会党组织机构	219

前 言

10月18日，我当选为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2月6日，我辞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其间整整是50天。这50天不过是几个月前已经开始的那段时期的一个阶段，但确是至关重要的一个阶段。在我看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通过人民实现政治关系革命化的过程还远未结束。

在那些日子里，我身负重任，而且真心实意地想负起责任来。同我的政治朋友们一道，我主动改变了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的政策，因为我意识到，前领导人一直在不断加深他们本身脱离现实的政策同人民意志之间的矛盾，并把我们的国家引向严重危机。

关于这50天，我本打算沉默一段较长的时间。1989年11月间，沃尔夫·比尔曼在一篇题为“克伦茨何许人也？”的文章中，把我作了一个比喻。正是我对这个比喻的思考，改变了我的初衷。他在文章中向我展示的前景比作“琥珀里的苍蝇”，只能维持一小段时间（琥珀是他一首歌曲的名字，其中提到我）。随便什么东西都曾使我受过惊吓，可是在那50天里我也学会同那些对我本人的不同称呼对付着过日子。人们把我叫做弹簧脖子，希望之星，选举舞弊者，为反对派

挂桂冠的人和大墙开放者等等。我被视为惊人地活跃，同时又患糖尿病，是酒徒，训练有素的微笑政治家，慈父，但又是一副憔悴的青年团面孔。我是个强壮的男子汉，应急人物，派别社会主义新开端的设计者和官僚主义的侏儒。漫画家为了更好地表达我的政治内心世界竟然还学会掌握牙科知识。所有这一切，我都比较容易忍受，唯独那个奇怪的比喻使人难以接受：琥珀里的苍蝇，作为一个观赏物身陷囹圄，同观赏者没有接触的可能，甚至无法进行事后表白。

难道对我当时的言行还要作什么补充吗？我认为是有必要的，因为50天里做出的一切决策，尽管主观上是真诚的，客观上是必要的，但也不乏匆忙与恐惧，缺点与失误。有些事没有讲出来，或是被误解，有讲错的地方，也有言犹未尽之处。很多事缺乏解释和分析，因为情况瞬息万变。

今天，事过境迁，某些事情已有可能更加准确地做出判断。而且似乎也有这样的兴趣，因为两个德国和其他地方的记者和猎奇者每天都来敲打潘科^①的家门。新年的时候，一位牧师邀请我去他家谈话。很多讨论和记者采访，我都以时间为由加以拒绝了。我请求，对我这本书中的一些说法不要产生误解。我讲话，并不是由于感到痛苦，不是由于失望，我并没有感觉受到同志们或是周围环境的侮辱。我深信，我的民主社会主义理想是有发展前途的。我希望我的国家能坚持维护已被历史认同的一段历史。我虽被开除出党，但凡能做到的，我愿向党和国家奉献一切。至于做到什么地步，只有留给时间去回答。

① 潘科，柏林市的一个区。——编者

我并不为自己辩护，我讲的都是压在心底的话。关于我们的制度我知道很多事情，但有些事也不甚了了，按理说我是应当知道的。我不委罪于人，而愿共同承担。

第 一 章

埃里希·昂纳克下野

一、上层人事更迭

1989年10月18日，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在柏林召开第九次会议。中央委员会当时有200多名委员和候补委员，他们来自共和国的各个专区。大多数委员们都对一封邀请函感到吃惊。他们收到前一天刚过16点发出的加急电报，干巴巴的电文写道：“敬爱的同志们。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根据政治局决议订于1989年10月18日，星期三，14时在中央委员会大楼召开。会议日程：讨论政治形势。致社会主义敬礼，埃里希·昂纳克。”可是就在几天以前，10月13日的时候，他们收到了另外一封完全不同的参加第九次全会的邀请信。该邀请信规定，由埃里希·昂纳克作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筹备工作报告、政治局工作报告，以及德国统一社会党90年代社会战略提纲。柏林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在10月17日的时候临时收到了由信使送来的加急电报，还有一封提前召开中央全会的邀请函。他们收到的信件令人惊奇的是：会议日期不是印在那种大家都很熟悉的有“总书记”字样的信笺上，而是印在一张普通的白纸上，虽然上面也有埃里希·昂纳克的签字。从参加会议的形

式上就已经看出第九次全会的内容了。

通知召开九中全会的加急电报

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

敬爱的同志们：

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根据政治局决议定于1989年10月18日，星期三，14时在中央委员会大楼召开。

会议日程：讨论政治形势。

致社会主义敬礼！

E·昂纳克

召开九中全会的第一次通知书

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致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 1989年10月13日，柏林

敬爱的同志们：

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下(第九)次会议定于1989年11月15、16和17日在中央委员会大楼举行。会议于10时在大会堂开始，从翁特瓦瑟大街入口。

会议日程：

- 1. 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筹备工作中党的任务。**

报告人：埃里希·昂纳克同志

2. 政治局报告。

3. 德国统一社会党90年代社会战略提纲。

报告和提纲将于会前送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

致社会主义敬礼！

埃里希·昂纳克（签字）

召开九中全会的第二次通知书

致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 1989年10月17日，柏林

敬爱的同志们：

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根据政治局决议定于1989年10月18日，星期三，14时在中央委员会大楼举行。

会议日程：讨论政治形势

致社会主义敬礼！

埃里希·昂纳克（签字）

另外，还在传说一些不寻常的事情。例如，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中央委员哈特穆特·柯尼希和自由德国青年联盟外事专家约亨·维勒丁（当时还是中央候补委员）于10月6日联名写信给埃里希·昂纳克，要求在两周之内召开中央全会。“这样一项决定符合党内多数委员和候补委员的愿望……”他们这样写道——顺便说一句，这件事我是知道的——并且指出，“中央委员会立即了解当前的形势对第十二

次党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是必要的。”10月7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40周年国庆招待会上，人们还在用手捂着嘴谈论这封信的时候，一些艺术家和作家，如曼弗雷德·韦克韦特、赫尔曼·康德、京特·格利希和格哈德·霍尔茨—博伊默特等人也都是中央委员，他们已写信表示同意这封信的内容。在同中央委员会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库特·哈格进行讨论的时候，继续有一些艺术家，文化干部和科学家表示要求提前召开中央全会。玛戈特·昂纳克参加了这次讨论，虽然当时党政不分，她作为教育部长起码表面上总要通过库特·哈格来坚持她的政治观点，让她吃惊的是，这位哈格在文件传阅时就已对这样一种要求表示了同意。在专区里，这样的呼声越来越高。

凡是实事求是的人本来都会感觉到，事情的发生有些紧迫。主要是想打破政治局那种让人难堪的沉默：面对民德国内政局的急剧变化，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给人造成压力的出走浪潮，许多中央委员都期待我们政治局的成员能说话，可是等待已经完全厌倦了。他们感到被政治局抛到一边。一段时期以来，政治局已没有什么活动，现在甚至连作用都不起了，仿佛处于一种灾难性的催眠状态。但有许多人开始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要在党内发挥应有的作用，这在当时的情况下的确是惟一的好现象。两次党代表大会之间的决策机构不就是中央委员会吗？建党的这条原则看来几乎被遗忘了，因为政治局在很大程度上剥夺了中央委员会的权力。任何实质性的争论都从会议上抹掉了，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把委员会变成了表决机器。从而我们就把自己推上了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王座。但是现在，这个王座动摇了。要求迅速召开全会（这是我们对中央委员会会议的习惯称呼），同时也就是要求坦率诚恳地分析出现的形势。要求就必要的现实步骤进行讨论，但也

要求我们党进行一次大辩论，讨论一下在一个需要变革的国家里未来应走什么样的道路。我心里明白，在苏联进行的改革不能简单地移植到我们这里来。但是也要肯定，必须按照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和改革政策在我们这里进行必要的改革。

我的重大错误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认为，可以和埃里希·昂纳克一道进行方针政策的变革。他的政治经历给我的印象很深，而且我认为，鉴于明显的事实，即使从务实考虑，昂纳克也应站到社会必然发展的一边来。最后我终于认识到，同昂纳克就一项接近实际的政策细节花上力气，甚至绞尽脑汁进行认真讨论已是不可能的事。到了这个时候，许多宝贵的时间已经浪费掉。甚至今天我要说，浪费掉的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时间。而对国内党内日益复杂的局面，昂纳克害怕任何形式的讨论。他企图躲进抽象的未来幻想中去。他把2000年的景象描绘得再好不过。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用一份由他签字的纲领性文件把老方案带到90年代去。中央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最初的内容也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规划出来的。

急需尽快采取行动。即使准备工作还不够充分，现在也必须紧急解决干部问题，解除埃里希·昂纳克及其亲信们的职务。

10月18日到了。快到14点的时候，我从中央委员会大楼二层我的办公室走向大会堂，当时几乎所有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都已坐在位子上。可以明显地感到大家都很聚精会神而又非常紧张。在这座有点过于舒服的大厅里像这样的气氛是少有的。我从主席团的位子上环顾一下四周。实际上我已有把握，会有多数人主张解除埃里希·昂纳克、京特·米塔克和约阿希姆·赫尔曼等人的职务。我知道，为了在全会上取得多数，某几个知己在筹备第九次全会的过程中工作很积极。其中